

用好8500亿医改资金需要大智慧

■今日视点

“今起3年，预计投入8500亿元，重点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五项改革”……1月21日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审议并原则通过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》和《2009—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。

(1月22日《现代快报》)

在医改公益性原则确定之后，如何确保投入的医改资金落实到位，让百姓受益，成了医改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该怎么确保这8500

亿医改资金的安全呢？

首先必须加强对医改资金的监管。无数惨痛的经验和腐败案例告诉我们，每当国家为某一领域或项目投入巨额资金时，总会有一些不法之徒意图染指，把国家的资金和财产当成可口的唐僧肉。特别是那些掌控国家资金使用分配权的掌权者，更容易行“雁过拔毛”的腐败伎俩。因此，有关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医改资金的管理监督，确保医改投入资金不被挪用乃至贪污。

其次，要把医改资金不折不扣地用到老百姓身上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谈到新的医改方案最需要解

决的问题时，58.7%的受访者认为“如何把政府投入切实用到老百姓身上”才是最关键的。因此，在医改资金的使用上，要防止那种借医改之名、不行医改之实的行为。比如，不能把有限的医改资金大量用于医务人员发奖金福利，不能把有限的医改资金用于豪华医疗场所的建设。而应该用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，提高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，建立医疗保障、药品供应保障体系，补贴群众看病、降低群众看病费用。

最后，医改资金投入要多向基层、农村倾斜。长期以来，

我国医疗投入存在重城市轻农村，重大医院轻基层医疗机构的倾向，大量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和一些大医院，导致了基层和农村严峻的医疗问题。当前医改目标已确认为：为百姓提供安全、有效、方便、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，促进人人应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。要想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疗保障体系，以往基层和农村欠下的债现在必须还上，因此，在医改资金使用上必须要多向基层、农村倾斜，缓解城乡、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扩大的趋势。

(孙瑞灼)

■相关评论

新医改方案中提到，为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，从2009年开始，将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。

(1月22日《新京报》)

建立健康档案的必要性自不待言，但北京等地的健康档案试点过程表明，人们在欢迎健康档案的同时，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隐私的问题。

个人信息不被泄露、不受利用，这是公民隐私权的一部分。健康档案的建立过程，就是公民基本信息和健康信息的采集、储存过程。如果在这一过程中，没有良好的隐私保护机制作保证，那么公民隐私

被泄露、被侵犯的结果，将可能是一场灾难——事实上，由于网络、手机等技术越来越发达，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滞后，个人信息被非法采集、倒卖等问题，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。

这其中，就有不法分子相互勾结侵害公民健康信息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，深圳每年有10万孕产妇个人信息泄露，这些信息被刻录成光盘，以每张1.2万元的“一口价”公开销售。全国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，将使这种让不法者大流口水的有价值信息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，要避免个人信息

被泄露利用，就必须有一个未雨绸缪的保护机制。在个人信息立法尚未取得突破之际，健康档案信息保护理当独善其身，作出有益的尝试。

对公民隐私的保护，应当从信息采集阶段就严格控制。既然是健康档案，就不能随意扩大信息采集的范围。“最必要、最先制”应当成为信息采集不能超越的红线。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确定统一的信息采集项目，各地和具体采集部门及个人不得扩大采集范围。

健康情况尤其是疾病信息，是公民最核心的隐私之一。

比如，在相当严重的乙肝歧视、艾滋病歧视面前，一旦某个人被公开为上述疾病，很可能在社会中寸步难行。因此，健康档案应当由公民个人持有，信息库资料必须严格规定查询的条件，使健康信息限定在最小的知晓范围内。对于随意散播、出卖、收买健康信息的人员，要预置严厉的惩处措施。

同时要畅通公民权利受损后的救济渠道，包括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等司法便利措施。确保公民健康信息泄露之后，不需要公民自己去搜集证据，而由负责健康档案保管的机构自证清白。

(周东飞)

医改健康档案要先过隐私关

【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】

河北邯郸市很久没有过任满一届的市长了。《时代周报》1月22日的报道说，这个地方十几年间换过八任市长，每任都没有能够任满5年。

这个报道算不算新闻，我感觉很犹豫。按定义来说，反常即是新闻，异象即是新闻，而官员做不满任期，这算什么反常和异象呢，太正常了，我们每天见的都是这种情况。不过，如果按照职位设置的规则，这又是反常的，职位设置的规则上，市长任期是5年。

《时代周报》又提供中国市长协会的调查，2002年到2006年任期内，更换了一次市长的城市占61.3%，更换了两次市长的城市占25.3%，没有换过市长的城市占13.3%。事实就是这样，规则上写着的，实

际上一定要被违反，以至于违反到使规则成了废纸，违反到规则被违反变成正常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。

我不能说市长就不能中途更换。市长违法犯罪了，腐败受贿了，引咎辞职了，当然要更换。但市长更换频频，却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们是因为“工作需要”被调走了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愉快地走到新的岗位上去了。

基层官员拥有很大的权力，拍板算数的事情几乎可以随便做，“规划局”就是市长的绘图员，这个说法可以反映党政官员的权力是何等重要和大。频频更换官员，产生的效果就是“一个师傅一个法”的情况无比多，这个要做机场，那个要抓市容，这个要上这个工程，那个要上那个项目，人在走马灯地换，城市就像无头苍蝇乱飞。

这当然不利于城市的发

展。然而，对官员个人的升迁，却是大有好处的。无须干满一任，每个官员就需要抓紧做出看得见的业绩，所以要做立竿见影的事，而且用力必须要猛，一种类似于过山车的城市节奏就建立起来了，业绩出现了，官员的升迁之路也铺成了，高高兴兴走到新的岗位上去，就有资本了。

官员在一个位子上安坐不动，尸位素餐，没有风险，大家都有意见。现在，这一点是否有改变呢，基本没有改变的，如果一个官员“望断官场路”，那么完全可以继续坐铁交椅。但是，如果一个官员有仕进的前途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在一个位子上做满任期，那是多么缓慢的过程啊，简直就是仕途的失败。故此，一个地方如果官员总是做不满任期，意味着“这个地方出干部”；一个官员如果老是这里那里，意味着“进步快”。

谁对城市和它的人民负责呢？我看有些时候就是没有。邯郸就是这样，一个市长，被调来了，人大一举手，上任；又被调走，人大一举手，走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也要说“对全市人民负责”，也要说“感谢全市人民”，但终究只是“工作需要”。“工作需要”，而非一个地方的人民的需要，使他被调来和被调走。

一个地方的官员职位，有时竟然会变成晋升的中转站，而不是当地人民可以寄托愿望的职位，这不是很怪的事情吗？某一职位是必要的，在于一个地方的人民希望通过这一职位的设立以实现其福祉，而不是为着使之成为任何人的跳板。我只能说，很大程度上，作为官员跳板的职位是对公共权力的僭用。

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，《长江日报》评论员)

■相关评论

“市长走马灯”是在折腾百姓

“十几年换八任市长”怎能造福民生呢？我们不是经常诟病那些“一任领导一个规划”的草率现象吗？“十年换八任市长”，城市规划、民生规划如何能落实和实施？估计人头还没摸熟，市长大人就调任他职，任上的项目和计划，就算是砸下了巨额资金，也可能因为接任者执政思路的差别和不同而付诸东流或暂时搁浅。一座邯郸机场，几乎见证

了邯郸历任市长的来来往往，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——唐若昕任市长时为邯郸确立了数十个重点项目，其中邯郸机场已被国家计委立项。唐若昕离开之后，赵禄祥继任邯郸市长，机场项目被搁置了起来。而那些百姓望眼欲穿的民生项目，因为市长的调动而成为“邯郸机场式”的结果，媒体披露的为数不少吧！而换一任领导上马一批新项目的重复

建设和资金浪费，更让一些地方陷入了折腾的困境。

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和延续性，一个城市的持续稳定发展，更是如此。要让地方领导在任期内有所作为、干出点事业造福民生，必须假以时日，这难道不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吗？“走马灯”式的市长是在折腾百姓，也是可持续发展面前的一道坎。

(吴杭民)

“按摩账单”的真假不妨碍反思

■公民发言

有网友把几张休闲中心的按摩账单曝光了，据称签单报销的是浙江某县级市审计局局长韦某某。结账小票列明的服务包括贵宾包房费、加钟、小费等。目前账单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，当地官方也未回复。

(1月22日《现代快报》)

有人跟帖说：“网民别‘人

肉上瘾’，逮住半张账单就满嘴跑火车，可能是污蔑韦局长哟。因为别人身为一市国家财政的‘看门狗’，咋可能去享受欧式按摩呢，且所给小费出手那么大方”。但这么一份清楚楚的按摩账单，恐非一句“纯系作假”便能轻易消解疑团的。虽然网民们这种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现在还停留在“地上捡单、网上互传”的

浅表层，但其侵润作用不可低估。单就近三亿网民的这个数字，就足以让任何“私奔”的官员后背流汗——即便遮住一时，也难遮一世，“穿帮”常常有，“死守”常常败。其实，就算这按摩账单最终确认真是假的，我认为也并不影响我们对当前审计部门监督不够的反思。

前审计长李金华曾说过，

“审计者面前的诱惑太多。目前，我的最大压力是审计人员能否抵挡外界诱惑。”李金华的这句大白话道出了人们普遍的忧虑——谁来监督审计者，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性的追问，“按摩账单”的出现，无论其真或假，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完善对审计者的监督，就算不枉大家“人肉”它一回了。

(周明华)

反抢劫实战演习是种“职业病”

【中国观察之潘多拉专栏】

云港市一家城市信用社组织一次反抢劫演习，为了追求逼真效果，在市公安局经保科的许可和“110”指挥中心的配合下，决定事先不通知信用社职工，并将一名储户装有20万元现金的红色尼龙手提袋抢走。随后4名歹徒分头逃跑，两个小时后均被抓获。

(1月22日《广州日报》)

不要以为又发生了一起银行大劫案，其实这是一次反抢劫演习，但又不是普通的演习——歹徒是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安排人扮演的，除公安局局长和副局长外，全体参战民警和储蓄所员工无一人知道这只是演习，“一切从实战出发，就是要检验各警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。”据报道，警方高层对结果很满意，但舆论对此提出了尖锐质疑：

如此“假戏真做”，万一民警使用武器，造成人员伤亡该怎么办？被“抢”储蓄所的员工受到了惊吓，又该谁来负责？

舆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，但组织演习的警方高层不可能是傻子，他们当然很清楚，搞这样一场“假戏真做”的实战演习，要承担多大的风险。但他们依然这么做了，并对演习结果很满意，说明在他们看来，与由此宣示的警方突出成绩和可观政绩相比，为演习承担风险是值得的，包括在演习中可能出现的人员伤亡和各种损失，或许事先都已经计入了“演习成本”。舆论提出的那些质疑，在当地警方人士那里大约根本不算什么。

上述分析或许会被认为是“诛心之论”，但我作此推断，并非没有事实依据。几年前，连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，有文集《英俊的丑角》等问世)

“百万公车门”不能仅有解答

■热点纵论

近日，一篇名为《北川政府110万采购豪华越野车》的帖子引发网友热议，帖子中展示的“北川采用工作用车中标公告”中显示，1月12日，北川县以110万的高价购得兰德酷路泽越野车一辆。

(1月22日《新快报》)

面对质疑，当地政府采购中心作出了说明：其一，越野车的中标价是74.7万，并非网友所说的110万；其二，最初购买该车时，考虑不充分，事后考虑到该车价格较高，就放弃购买了。这么说明之后，似乎这事已经解决了。但恰恰从这种很熟悉的“解答”套路中，我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
比如，这两天对于网民质疑“安徽蚌埠国土资源局天价消费账单”，蚌埠国土资源局最重要的解答是：“帖子中的账单都是以前消费的，并不是现在的。”显然，该局避开了人

(李辉)

火车票实名制印度不是榜样

■他山之石

当下主张“火车票实名制”的声音很多，而常被拿来作为样板的，则是邻国印度——搞“实名制”一百多年了，一直没有倒票问题。

实行了实名制的印度就不存在倒票问题，车站也没有黄牛党，或是事实，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？则未必然，这就好比一个喜欢吃苹果的人皮肤白嫩，并非吃苹果让其白嫩。事实上，目前在印度，实名制并未被严格执行——在售票时由旅客自行填写，不查验证件。旅客出入站以及在车上，也没有人查票。可见，形同虚设的实名制与“不存在倒票”之间，完全没有因果关系。

如果从“榜样”的角度看印度的火车，印度其实是一个坏的榜样，除了它的无比便捷的售票系统之外，毫无可取之处。我甚至相信，在正在改革中的、正在紧追中国不舍的印度，

免费、低价、实名制……在不久的将来都将消失，不如此印度的火车就会速度依然那么慢、服务依然那么差、乘客依然那么挂在车厢外面、一次事故依然要死那么多人、火车站依然那么像难民营……

中国是印度的榜样，而不是倒过来——中国铁路建设的成就毋庸置疑，那是改革的结果。我们的市场化目前正遭遇两处阻力：一是火车票价的市场化，一是铁路运营体制的市场化——前者导致了短缺，催生出黄牛党与腐败。而后者导致的是，即使不惜代价搞实名制，对内部倒票依然毫发无损。

经济学家呼吁提高票价，乍一看是与公众为敌，其实对于有能力进行权力寻租的人来说，火车票越短缺越好。唯有市场化可以抑制腐败，既得利益者知道这个常识，我们也该知道。

(作者翟春阳，原载1月2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